

返·观·与·重·构

返·观·与·重·构

钱·理·群·著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返 观 与 重 构



——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钱理群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ISBN 7-5320-6479-4

I. 返... II. 钱...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380 号

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钱理群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40,000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本

ISBN 7-5320-6479-4/G·6634 定 价:(软精)1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史和文学史家

- ② 一 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
- ②8 二 一以贯之的史识
- ④0 三 “寻找你自己”
- ⑤1 四 史家的风范
- ⑥1 五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惑
- ⑧0 六 “挣扎”的意义

第二章 文学史的观念、方法与写作

- ⑨6 一 典型现象与单位观念
- ⑪3 二 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
- ⑪9 三 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
- ⑫5 四 “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
- ⑬3 五 结构与叙述
- ⑭3 六 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审美形态

第三章 现代文学研究思路之探寻

- ⑰2 一 多学科的综合眼光





- ①78 二 目标与选择
- ①84 三 研究的想象力
- ①86 四 “分离”与“回归”
- ②02 五 创作的超前性与评价的相对化
- ②06 六 警惕“现代学术”的陷阱

第四章 开拓新的学术空间

- ②14 一 “百年经典”的意义
- ②16 二 20 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 ②30 三 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学术化
- ②35 四 金庸的挑战
- ②44 五 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中的一个问题
- ②61 六 现代区域文学研究的新开创
- ②65 七 大学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 ②84 八 现代散文与现代传媒的互动
- ②90 九 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

附录 编辑手记

- ③16 一 呼吁研究视野、方法的开拓
- ③18 二 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 ③19 三 提倡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
- ③20 四 回应“重写文学史”

- ③22 五 为“沦陷区文学研究”鼓吹
- ③23 六 不可忽视学术研究中的“冷处理”
- ③25 七 但愿保持平实的学风与人生态度
- ③26 八 我们这个学科不再年轻
- ③27 九 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
- ③29 十 坚持忠实于学术的献身精神
- ③30 十一 自觉的学术承传与创造
- ③31 十二 拿出“真”的精神产品来
- ③37 十三 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辨正
- ③39 十四 开拓新领域,打开新局面
- ③42 后记



第一章 文学史和文学史家





一 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

——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

(一)

1989年8月,王瑶先生在烟台编完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在《后记》里,再次确认“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也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接着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目前新论迭出,诸说纷呈,本书所收各文皆与此无涉;作者只是对于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作了一些平实的考察,这对于重视历史发展脉络的人或者还有某种参考的价值。果真如此,作者就很满意了。

同时写到的还有另一层意思:

经常注视历史的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即把事物或现象都看作是某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这同专门研讨理论的人习惯有所不同,在理论家那里,往往重视带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或如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或如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之类。研究历史当然也需要理论的指导或修养,但他往往容易把



极重要的事物也只当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否有所蔽呢?我现在只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还无力作出正确的答案,这或者正是自己理论修养不足的表现。

这显然是王瑶先生对他一生治学道路所作的总结与反思——他似乎是预感到了什么,特意把这些明确指示留给了后人。

把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这正是王瑶先生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论的核心,也是他的重要理论贡献。回顾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曾经经历了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的转化;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正是在研究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的一个标志,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把文学史研究混同于文学批评、鉴赏的习惯、传统仍然顽固地影响以至支配着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长期停留在作家作品汇编水平上的重要原因。这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作出理论上的界定,就成为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环节。正是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个年会的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史的“质的规定性”的问题,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不同



的特点。……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

这里，首先确认的是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文艺学”的性质。正像王瑶先生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时所说，这“是对长期存在的‘以政治鉴定代替文学评价’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个否定；并由此明确，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衡量一个作家对文学史的贡献，确定其历史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而对作品质量的评价则应该坚持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注意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这就“使得作家作品的研究不但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局面，而且更切合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真正成为‘文学’的研究，具有了‘文学的眼光’”^①。——应该说这是向着“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目标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其理论与实践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这又是最初的一步，而且王瑶先生的主要理论兴趣似乎并不在此，因而给后来者留下了很大的发展余地。

王瑶先生最为关注与倾心的，还是在“确认文学史的历史科学性质”这一方面。他反复地强调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眼光”，即是要确认两个基本观念：“过程”的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并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

在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观中，最重要的是，把一切文学现象都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与消亡的。由此而引发出两个基本观点：首先是一切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与不同程度的研究价值。朱自清先生曾引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的总是有道理的”，强调“我们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①；王瑶先生则认为，“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②。在另一篇文章里，王瑶先生又进一步阐述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确“有不少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作用，但本身在艺术上并不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也有一些失败之作。那么，这些作品今天是否就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了呢？这里有一个着眼点或观察角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文艺鉴赏的角度，选一本现代剧作选，这类作品当然不必入选；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以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当然不能采取简单排除、否定了事的态度”^③，从这类作品何以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出现，并且产生了何种影响的角度去考察，自会产生一种“历史的”研究兴趣与价值。当然，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所说，老黑格尔的命题的反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也许更有意义。这就是王瑶先生在前述自我总结中所说的，文学史家从不把任何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的创造）凝固化与绝对化，而仅仅“当作是

①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06页、20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中古文学史论》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关于开展话剧文学的研究工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这无疑是一种极富“革命性”的思想，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①，它使我们从“变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文学历史运动，一切作家与作品都是这一历史发展链条（线索）上的一个环节。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正是在于理清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线索、链条），从而科学地说明“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②。而所谓作家作品的历史研究，本质上乃是一种历史的“定位”，这就是王瑶先生所说的，考察“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什么影响”，从而确定其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与历史的相对价值——随着过程的发展，将逐渐失去存在的理由而为新的历史创造所代替。

但是，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陷阱”——按照我的理解，王瑶先生在前述“后记”里所说的“有所蔽”，即是指这类“陷阱”。所谓“失去存在理由与价值”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包含了其真正有价值的合理内核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而融入历史的新的发展与创造中，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的相对价值中是包含了若干历史的绝对内容的，在历史的不息变动中也包含了某些恒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定不变的因素,否认了这一点,就会如王瑶先生所说,忽视了“带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产生“相对主义”之“蔽”。

历史发展过程也并不是如历史进化论所说,是一种“直线上升”的历史运动。王瑶先生在一篇与胡适辩论“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文章里,就曾对“每一时代的文学总比前一代为进步”的文学史观提出了质疑。王瑶先生引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的著名观点:“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产生于“社会幼年时期的希腊艺术和史诗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这是能够让人们认识文学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丰富性,而并非文学进化论的描述那样简单直线的。——尽管王瑶先生对于“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进化观”的质疑并没有充分展开,但他在1989年最后编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一书中仍把《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一文收入,至少表明他是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后来者当会从中得到启示。

“一切存在都是有理由的”这一命题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理论“陷阱”,即如果将一切历史上存在的文学现象视为“历史的必然”,那就会导致否认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独断论,“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①。王瑶先生是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历史不仅是成功者的历史,也是失败者的历史,不能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去研究历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史。”^① 历史运动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方向，即历史运动是“从过去走向现在”的顺向运动，历史研究是“从现在走向过去”的逆向运动。这种逆向运动决定了研究者是在知道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追溯历史发展的原因链条的；也就是说，研究者所面对的历史事实，是已经有了结局和既成形态，已经经过选择的实现了的事实，它是不能重演、补充或设想有另一种结果的。由此而描绘出来的历史秩序（图景），就必然带有某种主观构想的成分，很容易按最后的“结果”净化、简化了历史运动的本来面目与本体联系。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成功者崇拜”的历史陷阱，即以“成功”（成为现实）与“失败”（未成为现实）或“成功”程度的大小作为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以已经实现（或成为主要趋向）的历史选择为正确，未能实现（或未能成为主要趋向）的历史选择为谬误，进而否认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把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变成惟一的可能性，把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某种趋势或历史选择作为普遍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存在”不仅“有它的理由”，而且成为“必然”。这就会导致王瑶先生告诫我们切切不可陷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这样写出的历史，也就成为胜利者的宣传，而失去其应有的科学品格。

所谓“历史的眼光”的另一个侧面（与“要点”），即是“历史的联系”的观点，不仅“从历史的发展和运动中”，而且“从它的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中去把握文学现象”^②。这首先是“多样的”联系，

① 《关于开展话剧文学的研究工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包括文学与时代的联系,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作家文学之间的联系,等等。这里所强调的是,王瑶先生特别重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以为是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历史联系。他曾经明确提出“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中去客观地解释各时代的文学现象。他因此而批评了某一文学史著作“对‘史’的关联不重视”,“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把许多时代和生活情形都有着参差的文人,以一个标准或精神来平列地加以欣赏和考察”^①,以为这是违反了“史”的研究原则的。王瑶先生对文学与一定历史时代联系的特殊关注,固然由于“史”的研究的特点,也同样是反映了先生本人提倡“为人生的时代的文学”的文学观念的。王瑶先生在考察文学发展的多种联系时,还十分强调这种联系必须是客观的,具体的,而非主观臆想的;反过来说,一切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联系都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凭主观好恶而回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王瑶先生晚年在批评“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庸俗社会学的同时,也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淡化政治”的倾向提出批评。他的理由十分简单:至少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政治对文艺的影响、干预是一个客观存在。他常说,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即使在理论上鼓吹纯艺术的作家,仍然不能避免政治对他的创作的影响。因此,文学史家的责任是正视这一客观存在的联系,并对这种联系的背景、原因、表现、影响、作用……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与评价。

由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把文学史看作是一门历史科

^① 《评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载《清华学报》1947年10月第14卷第1期。



学,把“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的观念、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即如王瑶先生所概括的那样,是“由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联系的运动的“辩证思维”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史学品格、学风的确立,这就是王瑶先生所说的“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以正视历史的勇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①以上两个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王瑶先生在《念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 90 周年诞辰纪念会的讲话》中,都一再提及清末以来历史研究存在“崇古”、“疑古”与“释古”三个派别与趋势,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以“释古”为理论旗帜的清华学派的。“崇古”、“疑古”、“释古”的区分是冯友兰先生在 1935 年所写的《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一文中首先提出的;40 年代朱自清先生在《现代人眼中的古代》等文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所谓“崇古”、“疑古”、“释古”,冯、朱、王三位先生的解释不尽相同,应该说包含有多方面的意义:既表示对于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料的不同态度:“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疑古一派“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一派,……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冯友兰)^②;又表示对古代传统的不同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

②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学术文集》第 33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同态度：或“迷信古代”，或“怀疑古代”，或“解释古代”（朱自清）^①。冯友兰先生又说：“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② 这就是说，疑古派（也许还应包括崇古派）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材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释古派的史学（包括文学史）研究则要求进一步对史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③，这就需要对于历史事实作出判断、选择、概括，显示出史学家的见解、眼光，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史识”。这样，疑古派与释古派的区分中就提出了一个“史料”与“史识”的关系问题——这正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重点。

冯友兰先生在区分了“信古”、“疑古”与“释古”三派之后，接着又指出：“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讲，则‘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表示正、反、合的辩证法。”^④ 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准确，但他强调“释古”派对“疑古”派的否定是一种包含着肯定（继承）因素的辩证否定，则是对的。在“史料”与“史识”的关系问题上，释古派首先高度肯定了疑古派对于史料的重视与科学审视态度，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王瑶先生更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强调了科学材料的占有的极

①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06页、20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古史辨〉第6册序》，《三松堂学术文集》第4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朱自清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会的讲话》，《润华集》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